

当年文事

余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年文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年文事 / 余斌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305-05858-5

I. 当… II. 余…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552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当年文事
著 者 余 斌
责任编辑 姚 徽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66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858-5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鲁迅与广告	1
鲁迅的书账	5
“同路人”茅盾	8
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	14
茅盾与莫泊桑	21
《十八春》的雅与俗	30
张爱玲与林语堂	40
“白话邪宗”	49
姚颖与《京话》	60
徐讦与他的现代鬼故事	66
“诗人”邵洵美	76
《续结婚十年》“索隐”	82
石挥的小说	91

林语堂的“加、减、乘、除”	96
“妾身未分明”	106
《大地》风波	110
西南联大·大观园·鹿桥	120
《未央歌》与古典小说的文人传统	129
初期白话文	135
传记文学的两途	140
序跋之类	148
从“新格拉布街”想到“亭子间”	152
“三底门答尔”	159
劳动者的形象	164
记忆的修正	171
没“戏”	180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184
同人杂志	195
几则书刊广告	200
作家与出版家	207
不完整的书	212
社会小说的“做法”	217
尊卑有序	222
通俗作家的自卑心态	230
雅俗之间	237
旧武侠·新武侠·超新武侠	241
后 记	252

鲁迅与广告

把鲁迅这个名字与广告扯到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甚或有几分褻渎，因为人们对广告多的是厌烦，少的是好感。都说现而今是信息时代，而最富侵略性的信息，恐怕首推广告，因为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而那内容又皆咄咄逼人，足以“振聋发聩”，或是极尽挑逗之能事，隐然有你若不受招徕便要追悔终身之意。以我们对广告如此恶劣的印象，实在难以想象鲁迅与广告会有何瓜葛。

不过鲁迅的确草拟过不少广告，《鲁迅全集》中收录的就不下数十条，而广告的确也有不自吹自擂、据实道来的。

登在《京报副刊》上的《苦闷的象征》广告文曰：“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鲁迅告白。”这里毫无渲染，且特别声明书的性质，“其实”二字下得尤妙，犹云：

“书中并无‘性苦闷’之类，对某类书有特别兴趣之读者诸君幸勿误会。”搁在今日某些书商、出版社手里，那书名正可利用或是正希望其能有误导之效的，做此声明，岂非自断财路？

不妨拿近年某出版社所出林语堂《红牡丹》一书做个对照，那上面的广告语赫然写着“性的冲动，情的需求，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这已是堕入地道的“瞒与骗”了，我们通常所见的广告虽不致如此，然而夸大其词却是不免的，而说大话、唱高调，里面有意无意间实在也就含了“瞒与骗”的成分。鲁迅一生最反对瞒与骗，反对假大空，此种精神甚至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他拟的广告上。最好的例子是他为《莽原》重拟广告一事。

1925年，《京报》主持人邵飘萍与鲁迅商定出《莽原》周刊，随《京报》附送。邵飘萍遂拟了一条广告登在报纸广告栏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头一句即拉开架式，先声夺人；第二句问来亦是动人听闻，后面隐去刊名，则是故弄玄虚，设置悬念——广告的种种招数都用上了，似乎也并无大错。不道鲁迅看后大不悦，斥为“夸大可笑”，遂以第三者口气重拟一条，并“硬令登载”，且“不许改动”。于是第二天的《京报》上又出现了一则广告，云新出周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恳挚实在，诙谐风趣，与邵的夸张招摇恰好相映

成趣。

但是事情还没完。邵飘萍虽因“硬令”，只好刊出，内心却大约觉着太不像广告，故又在广告之后加了几句“无聊的案语”曰：“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鲁迅看了哭笑不得，给许广平的信中叹道：“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

鲁迅多半是要碰头的，因为他与“广告界”的精神实在大异其趣。广告的本意大约不过是广而告之，据此，广告的要求应是准确地传递出某种信息，而商家做广告意不在此，要的是“轰动效应”，是轰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依照前者，鲁迅的广告可得满分；依照后者，则恐怕要判不及格了。

当然鲁迅的广告还不止于据实相告，字里行间有调侃、有讥嘲，诸如“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之类的“滑稽”语，并非有意滑稽，亦非刻意摆出低姿态，而是暗有所指，比如这里就是和夸饰的作风唱对台戏，给邵飘萍们一点难看（邵飘萍应是同一战壕中人，后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但以其趣味而言，实与鲁迅相去太远）。这就传出广告以外的信息了。难怪未与鲁迅反目之前的高长虹，看了未名社出版物后面的广告后，道是“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这里的广告却像是批评”，赞其“别开生面”了。所谓批评像广告，乃是那时的评论与今日的情形相仿佛，多有标榜吹捧之嫌；至于广告像批评，看鲁迅拟的广告便知。

我估猜高长虹看到的是一则题作“《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

的广告。里面如此这般地写道：

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题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它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书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

写这广告时鲁迅与胡适为首的一群名流学者已然分道扬镳，胡适等人开国学书目、青年必读书，已被目为或是自许为青年导师。明乎此，则所谓“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国民非看不可”之类的反语，其批评锋芒指向何处，自是一目了然。

鲁迅确实是一位斗士、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他在回忆性的散文中固然时而借题发挥，对目下的人事旁敲侧击，甚至在广告中亦表达出自己的好恶，不忘对“学者们”“好的世界”施以一击。现代著名作家中许多人因为办书店、编刊物、出书，都曾写过广告，如茅盾、林语堂、叶圣陶等。因是文人，笔下自然另成一格，与寻常广告大异其趣。不过鲁迅仍旧显得特别，不必问谁是作者，单看这峭拔的文风，看看里面的反语我们便知道，是鲁迅的手笔无疑了。

鲁迅的书账

鲁迅的论敌常对他有些恶形恶状的描绘，有夸张他被香烟熏黄的牙齿的，有想象他的“醉眼蒙眈”的，又是烟，又是酒，撇开背景不论，单从这些字面上去看，鲁迅倒真像是“失意文人”，或是像个名士了。实则鲁迅最是个认真不苟的人，即在生活小节上也绝无文人习气。常到鲁迅家走动的郁达夫发现他的书房里总是整整齐齐，书案上亦井然有序，且一尘不染。这真让郁达夫这个地道的名士派大为讶异了，因为他所知道的一些文人，书房总是凌乱不堪的。鲁迅的不苟从他的日记上也可见出。他的日记并不像今日某出版社推出的《名人日记》之类，里面到处是“思想火花”和滔滔议论，而是地道的流水账，简而又简，但他每日必记，从1913年起，到1936年去世，几乎没有一天拉下。偶尔有几天漏记，也必要说明“失记”。既是仅限于记事，有时无事可记，记什么呢？记得最简的是只有天气，阴晴雨雪。

我有位同窗曾细读鲁迅日记，告我他发现日记中常见“濯足”、“夜濯足”字样，而且有好多日日记里只有这两三字。回想一下，恍惚也有这样的记忆。这当然不是“濯足长江万里流”的濯足，不过是在脚盆里洗脚罢了。想来鲁迅每日伏案到深夜，脚已冰凉，暖水温泡，甚是惬意，故尔常有此一记吧？据此也可推知鲁迅的日记多是次日记的，濯足完毕当从速就寝，不见得再去握管了。

不过鲁迅日记里记得最认真详尽、最清楚明白，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算他的书账。鲁迅有一习惯，每购一书，不仅在那一日记下书名，而且也记下书价，而且巨细无遗，毫厘不爽。比如《仇十洲麻姑仙图》等图，每枚价仅八分，也都一一记录在案。1913年5月买的一册《观无量寿佛经图赞》所记价为0.312元，更是精确到厘了（可知那时买书的讲价是极细的，但不知几厘几厘是如何找法）。每年岁末，鲁迅照例要算一回总账，将所置书籍、图册、拓片等按购置的时间顺序一一列出，月为单位是小结，最后算清一年共花费几何，此外又还常算出平均每月花去多少。

鲁迅自奉甚俭，衣的朴素随便是不用说了，吃住行也都很简单，唯在买书上手脚是大的。平均下来，每年所费在500元以上。到上海以后，也许是生活安定下来，做长久计了，书买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最多的1930年，总共花去2404元，平均每月约200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几个月的薪水。而到去世为止的二十多年间，鲁迅的书账加起来将近13000元，买下三处北京八道湾那样大的宅子也够了。鲁迅的收入不能算少，然要买这么多的书，总也感到吃

力了。1912年书账的后面有一段附记道：“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看来读书人买不起书、买得起书的人不读书的情形并不限于今日，然鲁迅不能“致之”的是古籍、善本，今日的读书人则在书店里面对着寻常的新书也不免有阮囊羞涩之感，只有流连忘返，不能满载而归了。

“同路人”茅盾

很久以前在《文汇月刊》上读到过丁玲一篇回忆瞿秋白的文章，文章写到瞿与她的好友王剑虹之间的恋爱，上海大学的情形，激进青年生活的种种，依稀传递出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革命罗曼蒂克的气氛。其中也提到了茅盾，虽只是顺笔带到，三言两语，我却至今还有些记得。其时茅盾在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瞿秋白则是社会学系的主任，丁玲记述她做学生时的印象，大意谓瞿秋白风趣平易，与青年学生融洽无间；茅盾相较之下则显得矜持，师生之界是有的，说望之俨然也许稍过，总之是更像学者教授吧。这恐怕很可以代表一般激进文学青年心目中茅盾的形象。并非是个人性情的品鉴（时代青年很少有这样的余裕），其中实在隐含着某种政治的评判和与此相关的情感态度。

须知学者、教授在社会上或者是受尊敬的人物，在革命青年的心

目中则多少是感到隔膜的。如果说五四时期,作为代表“前进知识阶级”的群体,他们为青年所崇仰的话,那么到大革命时代,教授、学者、名人而要能获得革命青年的衷心拥戴,前提倒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像学者、教授或名流。教授、学者体面的社会身份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秩序的某种联系,其本身似乎就与“革命者”的概念有着不小的距离(照理说作家也属所谓“知识阶级”,应该一例看待,但或许因为其主体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激进青年,故而作为群体,好像是被另做别论的)。即使倾向革命,教授、学者这些字眼所暗示的稳健、矜持、距离感、个人主义,等等,也妨碍他们无保留地献身革命。而在患着“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激进青年那里,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应是绝对无距离、无保留的。丁玲对茅盾的印象中,有意无意间正包含了这层意思,虽然茅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富于学者气质的作家。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一度消沉,与中共组织也失去联系,30年代他虽参加左联的工作,并且还是左翼文坛的头面人物,但事实上只被视为同路人。而在这之前,无须什么组织意见,在以革命主人公自居的青年那里,他无形中恐怕就一直被当作同路人看待。

做学生的丁玲不知道,那时的茅盾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是中共党员。即使知道了,也不见得会全然改变印象,因为他还是有别于那些职业革命家。而在职业革命家眼中,茅盾这样的党员可能只被看作组织的外围,或者也可以称作党内民主人士吧?近读郑超麟《怀旧集》,其中《回忆沈雁冰》一文谈到对茅盾的印象,很有意思,或者也代表了党内(尤其是职业革命家)对茅盾这一类人的看法。

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加入“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在中央机关从事宣传工作，曾做过瞿秋白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加入托派组织。在法国时，曾琦拉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给他看该组织的会员录，“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在‘新思潮’杂志（当是《新青年》之误）上写文章，如李大钊、恽代英、田汉、易家钺、王先祈、毛泽东，等等。出乎意外地，我发现其中也有沈雁冰……我想，原来沈雁冰也是属于‘新思潮’方面的，与那些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不是一类。”所以感到意外，当是在《东方杂志》上屡见沈雁冰的文章，《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所办，其不革命自不待言，这上面的名人在他想来与革命者总是两路的。这时的郑超麟尚未入党，应属激进青年，他的诧异感与丁玲最初对茅盾的最初印象，二者背后的意识，实有相通之处。

郑回国到中央机关工作后，与沈雁冰有较多直接接触。渐渐知道沈雁冰是很早的党员，有了党的组织就加入了。郑是回国以后入党的，所以论资格，沈雁冰比他老得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怀有成见，甚或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文章提到五卅运动中出现的两份杂志，《公理日报》是商务老板出钱让职工办的，照郑的推断，商务此举“一来为了表示爱国，二来是为了避免闹工潮”。故不敢畅所欲言乃意料中事。郑振铎是该报主编，沈雁冰无疑也参与其事。瞿秋白以为根本没有所谓“公理”可言，对该报极不满（可能多少也含有对沈的不满），遂创办《热血日报》。有意思的是郑对此事的议论：他承认《公

理日报》因其性质所限，沈雁冰作为编辑之一不能扭转局势，“但即使他是主编，《公理日报》也未必能像《热血日报》那样冲锋陷阵。我想，即使把《热血日报》交给沈雁冰主编，他也做不出瞿秋白这个成绩”。言下之意，自然是说沈四平八稳，不够坚定大胆，不够旗帜鲜明。

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下面这段话：“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完成的。沈泽民（茅盾之弟，中共早期党员）也是如此。但1924年秋和1925年春，我们奉命为‘国民议会促进会’和‘追悼孙中山’两个运动上街去演讲和散发传单时，沈泽民还是慷慨激昂的……我则未曾看见沈雁冰有此表现。”

这显然是不大有利的评价。看来那时党内对同志的评价，亦有不成文的标准，要视其是否足够“积极”而定，而“积极”须见于对组织的无条件服从，见于激烈的态度，尤见于群众斗争一类实际活动中之“风口浪尖”的表现，而不限于主义的坚执和完成派给的“任务”。像茅盾这样保持着某种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只能被视为消极了。组织安排给他的工作，在“做党内工作的人”的眼中，也许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吧？从郑超麟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到某程度的疏远，如果“我们”确能代表“党内”，则那时的党内对茅盾的态度可说是尊而不亲，这也正是后来对同路人、对民主人士的态度。

茅盾的独立性（或曰“消极”）尤见于大革命失败后的表现。蛰居上海期间，郑有一次去看他，“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农村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以为没有出路，“好像秋天的苍蝇，在窗玻璃上

乱钻，结果还是钻不出去”。这是郑“第一次从同志口中听到的公然反对党中央所行政策的言论”，吃惊不小，同时对沈的“公然反对”不以为然。他本人对现行政策也有怀疑，“但把反对的思想藏在心里是一回事，把反对的思想公开说出来，又是一回事”。显然，沈的言论如其不被理解为“离心”倾向，至少也被看作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了。郑回忆说，他已想不起来事后是否向党汇报了沈的谈话，但他的反应已见出二人对“组织”的不同态度。

有趣的是，这番谈话以及《蚀》三部曲中表露的消极情绪，倒是后来郑以为茅盾可以成为争取对象的一个依据。其时郑追随陈独秀，已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正从事“托派”组织的活动。茅盾从日本归国后，郑去找过他，“我是怀抱政治目的的，即是向他宣传托洛茨基主义”。他没有遇到茅盾。但事后他却悬想：“如果那天我见到他，同他说了话，以后又拿我们的文件给他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想至少，他对于中国托派的主张不会那样隔膜吧。”事实是，茅盾已回到中共主流派的立场，在小说《子夜》中，更有对于托派观点的批判。只是这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真正是党的同路人了。至于郑超麟这样的托派分子，则被开除出党，视为反革命，后来更被宣布为“汉奸”了。

虽然主张不同，茅盾与托派人物的私人关系倒未全然断绝。30年代他替生活书店编《中国的一日》，即转托汪原放请在国民党治下蹲大狱的陈独秀写一篇文章，陈文内容与当时中央的路线有不合处，他照样收入。抗战胜利后郑超麟托人将自己的一部译作送给茅盾，后者亦欣然收下，并且据郑所言，他还在来人面前大谈托派和中国共